



教育部面向21世纪
课程教材

城市社会学： 理论与视野

蔡 禾 主 编
张应祥 副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

蔡 禾 主 编

张应祥 副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蔡禾主编,张应祥副主编.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1

ISBN 7-06-02015-3

I. 城… II. ①蔡… ②张… III. 城市社会学 IV. 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4251 号

责任编辑:施国胜 装帧设计:雨田创意 责任校对:郭 声 技术编辑:黄少伟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510275

电话:020-84111998,84036003)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发行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地址:广东韶关新华北路 50 号 邮编:512026)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5.25 印张 258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4.80 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是教育部“面向21世纪社会学课程体系改革”项目成果之一。本书由中山大学蔡禾教授主编，是目前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城市社会学理论的教材。全书共11章，介绍了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下半叶形成的各种城市社会学理论流派，包括古典生态学、新正统生态学、文化生态学、城市性理论、社区权力、城市符号互动理论、城市研究中的社会网络理论、消费社会学、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新韦伯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等，反映了从传统的生态学主流范式向新城市社会学主流范式的变化。

本书适合于社会学、人类学、人文地理学、城市管理与城市规划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使用。

目 录

第一章 古典人类生态学	(1)
第一节 社区的生态性质	(1)
一、共生性	(1)
二、竞争性	(3)
三、人类社区的独特性	(5)
第二节 社区的生态过程	(7)
一、交通与社区过程	(7)
二、经济活动与社区过程	(8)
三、诸种经济因素对社区过程的影响	(9)
第三节 城市的生态模型	(11)
一、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	(11)
二、霍伊特的扇型说和哈里斯与厄尔曼的多核心说	(14)
第四节 古典人类生态学遭受的批判及其衰落	(15)
第二章 新正统生态学	(20)
第一节 霍利的人类生态学理论	(20)
一、霍利对古典人类生态学理论的批判性继承	(21)
二、生态组织的四原则	(23)
三、封闭与社会变迁	(27)
第二节 邓肯的生态复合体理论	(29)
一、POET生态复合体	(29)
二、POET生态复合体在分析社会变迁中的应用	(30)
第三节 新正统生态学理论简评	(33)
一、新正统生态学理论的影响和贡献	(33)
二、新正统生态学理论的困境及其局限性	(36)
第三章 文化生态学	(40)
第一节 传统城市生态学理论对文化的忽视	(40)

一、理想描述性理论	(40)
二、实证理性主义理论	(41)
三、方法论理性主义理论	(44)
四、文化因素可以忽略吗	(45)
第二节 社区文化对社区生态的影响	(47)
一、费雷对波士顿市中心土地利用的研究	(48)
二、乔纳森对纽约挪威人社区地域流动的研究	(52)
三、库波等人关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对城市规划影响的研究	(52)
第三节 文化生态学理论	(53)
一、文化生态学理论的基本观点	(54)
二、文化生态学理论与社区规划	(57)
 第四章 城市性理论	(62)
第一节 早期社会学家对城市性的描述	(62)
第二节 沃思：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	(65)
一、城市的界定	(65)
二、城市社会学的研究任务	(66)
三、城市生活方式的描述	(67)
第三节 甘斯：是“人口、密度、异质性”还是“特性”	(68)
一、内城、外城和郊区	(69)
二、新的解释依据：特性	(72)
第四节 文化的解释	(73)
一、杜维：是人口还是文化	(74)
二、科罗德·费舍：亚文化理论	(75)
三、一个20年后的评估	(78)
 第五章 社区权力	(81)
第一节 社区的权力模式	(81)
一、精英控制模式	(81)
二、权力“多元论”模式	(84)
三、其他社区权力分配模式	(86)
第二节 社区权力与社区事务	(89)
一、社区事务与社区权力的关系	(89)

二、社区事务的分类标准	(90)
第三节 社区参与	(92)
一、社区参与的功能	(92)
二、社区参与的途径	(93)
第四节 独立社区和依赖社区	(94)
 第六章 城市符号互动理论	(98)
第一节 城市符号互动论的主要理论观点	(98)
一、传统城市社会学与符号互动论之间的相异点	(98)
二、城市符号互动论的主要理论观点	(99)
三、城市符号互动论的研究实践	(103)
第二节 城市符号互动理论的研究方法	(104)
一、城市场所研究方法	(104)
二、城市人研究方法	(105)
三、城市形象的研究方法	(106)
第三节 莉恩·洛芙兰德的城市符号互动理论	(108)
一、城市生活三种领域理论	(109)
二、城市生活的观点	(110)
三、城市形象的理论观点	(111)
第四节 索尔·D. 阿林斯基的应用性城市符号互动论	(113)
一、阿林斯基的社区组织理论	(114)
二、阿林斯基的应用性成果	(115)
三、阿林斯基研究工作的意义	(117)
 第七章 社会网理论	(123)
第一节 社会网理论的发展及其在城市研究中的出现	(123)
第二节 城市社会网研究的主要领域及其理论观点	(126)
一、城市社区研究：从地域到关系网络	(126)
二、社会支持网	(130)
三、社会网络与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求职过程	(133)
四、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源	(136)
五、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	(138)
六、社会讨论网	(140)

第八章 消费社会学	(145)
第一节 对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反思	(145)
一、卡斯特对城市社会学理论的批评	(145)
二、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重构	(146)
第二节 集体消费与城市社会运动	(149)
一、住房不平等	(153)
二、大都会地区的交通和通讯系统	(154)
三、城市社会运动	(156)
第三节 桑德斯：作为消费社会学的城市社会学	(157)
一、从市场化消费模式到社会化消费模式：“二元政治理论”模型的构建	(158)
二、从社会化消费模式到私有化消费模式的转换：消费社会学的创建	(162)
第九章 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	(168)
第一节 列菲弗尔的城市革命理论	(168)
一、意识形态批判	(168)
二、空间资本主义殖民化和城市革命论	(169)
第二节 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社会	(173)
第三节 哈威的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	(175)
一、人造环境	(176)
二、资本积累、资本危机、资本循环与城市过程	(177)
三、城市人造环境与阶级斗争	(181)
第十章 新韦伯主义	(192)
第一节 雷克斯和墨尔的“住房阶级”理论	(192)
一、“住房阶级”理论	(192)
二、批评	(195)
第二节 帕尔的“城市经理人”理论	(198)
一、帕尔城市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198)
二、城市经理人	(200)
三、评价	(202)

第十一章 世界体系理论.....	(206)
第一节 从依附到世界体系.....	(206)
一、依附：全球化及其理论回应.....	(206)
二、世界体系：沃勒斯坦的新视野.....	(208)
第二节 世界体系论与全球城市化.....	(209)
一、世界经济与全球城市化的不均衡性.....	(209)
二、新国际分工与全球城市结构.....	(210)
三、全球经济重构与城市结构.....	(212)
第三节 核心国家的城市社区重构.....	(214)
一、核心城市的经济重构.....	(214)
二、核心城市的政治重构.....	(216)
三、核心城市的社会重构.....	(217)
第四节 边缘国家的城市化与城市重构.....	(222)
一、边缘国家的城市化和过度城市化.....	(222)
二、边缘国家的城市就业和非正式经济.....	(225)
三、边缘国家的首位城市问题.....	(226)
编后记.....	(232)

第一章 古典人类生态学

人类生态学与芝加哥学派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新城市社会学出现以前,人类生态学基本上统治着城市社会学研究,是主流的社会学理论和研究范式。

人类生态学自身经历着发展变化,通常人们用古典人类生态学和新人类生态学的区分来描述这一变化,这一变化过程反映在理论视野中是从偏重人类社区运动的生物类比向关注人类社区运动的社会因素转变。在古典人类生态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帕克(Park, R. E.)、麦肯齐(Mckenzie, R. D.)、伯吉斯(Burgess, E. W.)等社会学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节 社区的生态性质

顾名思义,人类生态学是借用了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而形成的一种理论。

一、共生性

在自然界,各种生物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构成一个“生命的网络”(Web of life)。达尔文关于猫与三叶草的关系的例子经典地再现了这种相互性。在英格兰,野蜂对红三叶草的授粉是不可少的,因为其他蜂不光顾红三叶草。如果野蜂很少或遭灭绝,红三叶草就会变少或消失,而一个地区野蜂数量的多少依赖于田鼠的数量,因为田鼠会破坏蜂巢。在英格兰,2/3以上的野蜂窝遭到田鼠的破坏。不过,在村落和集镇周围,野蜂的生存情况保持得较好,这主要要归功于猫。因为猫是捕鼠能手,而村镇中有许多人养猫。结果英格兰一些地方紫丁香的收成依赖于这些地区的野蜂的数量;野蜂的数量依赖于田鼠的数量;田鼠的数量依赖

于猫的数量；猫的数量依赖于村镇中养猫的人数。在这个生命网络中（或者说“食物链”），任何一个环节的破坏都会造成整体的破坏。

在达尔文时代，自然科学家对这种动植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尤感兴趣。在这种联系中，每一个物种都不能离开其他物种独立存在和发展，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共生”（Symbiosis）。共生并不是泛指一切由于偶然原因而生活在同一地方，但彼此毫无组织的若干物种。相反，它有着极其复杂的形式和确定的结构，而且，这种相互依存与其生存的环境紧密相关。生物学就是要研究“植物和动物在自然界的存在状态及其相互依存关系，以及每个物种同其特定环境的关系”（帕克等，1987，66）。生物学的研究方法是，首先通过某种特征识别环境的边界，比如通过对地形、雨量、水的深度识别沼泽、湖泊、河流这些环境，然后着手研究环境中的各种动物、植物和这些动植物之间的依存关系，研究这些动植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环境与那些与之相适应的动植物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Schwab, W. A. 1982, 6~7）。

尽管以上现象发生在自然界，但在人类生态学家的眼里，它也是对人类社区的写照。“人类是群生群居的动物，他无法单独生存，相对来看，人是弱小的，他不仅需要一定的环境保护他，供他居住，还需要有同类伙伴的协同合作”（帕克等，1987，65）。“在人类社会，每个人或群体都履行着某一特定的功能，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赖，这种履行不同功能的个人或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就是人类社会中的共生关系。比如，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就是功能上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Schwab, W. A. 1982, 7）。同样，人类社会的这种依存关系受制于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所能提供的资源。因此，人类生态学家也把研究人们之间的共存关系以及人们与环境之间的适应性关系视为己任。其研究方法是首先识别区域的边界，比如通过住宅、人口密度等特征来识别城市的边界，然后研究在这一城市中的人口数量和类别，研究不同人口群体之间关系和他们对城市生态体系的功能贡献。

对于这样一个由栖息地和居住者——无论居住者是动植物还是人——构成的生态体系，生态学家用“社区”这个概念来描述它。一个社区包含有以下三个最基本的性质（Park, R. E. 1952, 148）：

1. 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被组织起来的生物群体；
2. 彼此生活在一个共生性的相互依存关系中；
3. 对这一地域范围内的资源展开竞争。

每个社区都有其相对确定的结构，社区结构的形成意味着社区内各物种、各群体之间以及他们与资源之间一种均衡关系的实现。正如前面提到的三叶草的例子，其中任何一个物种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化都会引起“生命网络”的变化。那么是什么导致社区结构的形成，导致均衡关系的实现呢？生态学家在解释自然这一现象时，提出了“生存竞争”的原则。

二、竞争性

物种依赖于资源才能生存，但作为一个具有相对明确地域边界的社区，其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客观上存在物种需求与满足需求的资源供给不足的可能性。当社区内资源供给出现匮乏时，物种之间为争夺资源展开的竞争就不可避免。例如在自然界的植物社区里，阳光和水是各种植物竞争的最重要资源；在动物社区里，猎物是各种肉食动物的资源。对资源的竞争并非只在不同物种之间产生，在同一物种内也会存在。竞争的结果是“使物种的数量得到调节，物种的分布得到控制，自然界的均衡得以维持”（Park, R. E. 1952, 146）。例如，在三叶草的例子中，“猫捕食老鼠，鼠群也会因此获益。因为猫捕食的是病弱的老鼠，猫由此得到食物，而鼠群数量也由此维持在一个与它食物供给均衡的水平上”（Schwab, W. A. 1982, 7）。通过竞争得以生存下来的物种必然会在环境中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在不同物种的分工合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Park, R. E. 1952, 146）。竞争导致均衡。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在对资源的激烈竞争中，“区位”（Position）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为区位直接关系到能否有利地接近其他资源或得到其他资源。例如，好的区位有助于植物得到更充足的阳光和更充足的水分；好的区位有助于肉食动物捕捉猎物。所以，竞争必然会表现为区位的竞争，社区结构作为竞争的结果必然会反映物种在区位上的关系。

与生态学家一样，古典人类生态学家也把竞争看作是人类社会得以形成的基本原则。人类要生存就要有食物、水、居住地等资源，人类固然要靠合作来获取这些资源，但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它支配着人类对自己所处环境的组织活动。同自然界一样，“在竞争中，社区调整其成员的数量和质量，并在相互争斗的群体中形成一种平衡”（康少邦、张宁编译，1986, 69）。

施瓦布（Schwab, W. A.）把人类社会的竞争分为两种：一种是间接的、无意识的竞争。例如证券交易中的股票买卖；另一种是直接的、有

意识的竞争。例如两家公司同时竞投一块土地 (Schwab, W. A. 1982, 7)。在人类社会,使自己在竞争中取胜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同自然界竞争一样,占据一个有利的区位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商店如果不是建在一个有利的区位上,比如人流多、铺面临街,就难以吸引顾客;众多面临雇主挑选的寻业人员,如果能找到一个有利的位置接近雇主或引起雇主注意,就有更大的机会得到工作。一般来讲,在一个保持着连贯性、尚未被自然或人为屏障分割的地域里,最佳的区位是该区域的中心位置。因为,从中心位置到周边所有地点的距离是最近的,占据这一位置的人能从容不迫地对任何一点作出反应。相反,如果处在边缘位置,要与另一边缘位置上的人进行有效的交往就较困难。当然,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距离不完全是两点间的自然距离,还包含完成两点间交往的时间和成本。因为在自然距离仅有一公里的两点间,完全有可能比自然距离上相隔 10 公里的两点交往起来更困难。比如两所相隔一公里沼泽地的房子比两所由 10 公里公路联接起来的房子之间的交往距离会更远一些。距离与两点间的交通、气候、自然屏障、社会屏障等因素相关联 (康少邦、张宁编译, 1986, 71~72)。

在人类社会,使自己在竞争中优于对手还有以下方法可循:第一,改进技能,提高自身的价值;第二,与他人联合,在这个联盟中最大限度地分享这些东西。

对于古典人类生态学家而言,研究竞争的意义不在于对稀有资源进行争夺这一事实本身,而是在于发现通过竞争,社区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个结构中,人们如何取得和取得了什么样的与之相应的位置。这个过程与相互依存是一致的。

要了解古典人类生态学关于竞争对社区结构形成的意义还必须知道与竞争相关联的“统治”(Dominance)。在自然界的植物社区里,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现象,即在众多的植物种类中,总有一种或数种植物占据主导地位,它们的存在状况决定了其他植物的分布。例如,阳光是植物生长最重要的因素,在一个植物社区里,哪种植物能充分地吸收阳光往往就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植物。一般来讲,生长最为高大的植物占据这一地位,因为它能尽量伸展自己的枝叶来吸收阳光,而其他植物只能在它之下吸收到较弱的阳光,由此形成了一个植物分层。每低一层的植物都比高一层的植物吸收到更弱的阳光,而这些植物也形成了对这种较弱阳光的适应性。在森林里,这种植物分层通常是,苔藓处在最低层次,然后是草本植物和矮灌

木,最上层的是阔叶树。占统治地位的植物对该区内植物种类、数量、分布产生影响。或者说,它将某种秩序施于该植物社区,形成一定的结构并维持稳定(Park, R. E. 1952, 151)。统治的原则在人类社区中同样存在。城市的空间结构是与土地价值联系在一起的,城市的中心区往往形成于土地价值最高的地区,而中心区的功能定位直接影响到其他地区的功能分布,因此,中心区占据城市的统治地位。例如,在城市中心区周边往往会有一个过渡区,这是一个相对衰落的地区,多为贫民或少数民族聚居,这看起来似乎不合理,但这恰恰是中心区的统治地位决定的。因为中心区的不断扩张决定了周边地区成为下一步的拆迁区,因此,这些地区的屋主不愿维修翻新建筑,而是等待拆迁更新。而贫民和少数民族居住在这里一是因为租金便宜,二是这里离中心区近,方便在中心区谋职并有能力支付较便宜的交通费用。

“统治”这一概念在人类社会有更广泛的含义,比如我们可以说经济统治、政治统治、军事统治、文化统治等,不过作为人类生态学,最关注的是“统治”的空间的、地域的方面,即统治对人口或制度的区位结构的影响。在这一点,统治的基本功能无论在人类社区还是生物社区中是一致的。

从以上观点不难看到,生态学家与人类生态学家之间的联系是十分清楚的,它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Schwab, W. A. 1982, 9):

1. 二者都看到了自然和社会中的生态过程、模式,并且相信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揭示。
2. 二者都看到了在同一体系内不同成员间的相互依赖性对诸如气候、地形等环境的依赖。
3. 二者都同意“适者生存”是“自然规律”。
4. 无论自然还是社会,其发展并没有最终目的。

三、人类社区的独特性

古典人类生态学家也试图发现人类社会与生物社会的差别,帕克的人类社区是由生物层面和社会层面两个方面构成的观点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Park, R. E. 1952, 156~158)。

生物层面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它涉及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如水、土地或其他必不可少的资源。生物层面的问题涉及到人类能不能适应环境,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涉及到在一定区域内人口的规模问题,其生存与

竞争的生态性质正是生物层面的特征。因为人类为稀有资源展开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此竞争过程中，会自发地产生无计划性的群体间合作。这种合作起源于劳动分工，即当不同群体在社会中履行不同功能时，他们之间的合作就是达成最终劳动成果的必要条件，彼此之间相互依存——共生。

社会的文化层面是建立在生物层面基础上的，是一个以习惯、规范、法律、制度为基础的结构，它涉及到人类社会不同于生物社会的独特方面，即人类的理智、道德、心理。

帕克指出，人类生态学如果只关注建立在竞争——生物层面上的社会秩序，不关注建立在“共识”——文化层面上的社会秩序，那么，它与动植物生态学没有什么区别。动植物生态学传统上关注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物种的数量问题，如果照此，对社会的关注也只是一个人口数量问题。在这种关注下的人类社会往往是以自然分工为基础，以自由的、自然经济为纽带、按地域组织起来的，将这种社会联系起来的关系是物质的，而不是习俗的、道德的关系。帕克呼吁，人类生态学应该认真思考人类社会竞争受习惯和文化制约这一事实。在他看来，人类社区是由人口、器物（物质文化）、信仰（精神文化）、栖息地的自然资源四个要素构成，四个要素间的互动关系随时随地影响着社区的生物性均衡和社会性均衡。人类生态学就是要研究生物性均衡和社会性均衡得以维持的过程，研究一旦生物性均衡和社会性均衡被打破，从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向另一种相对稳定秩序转变的过程（Park, R. E. 1952, 158）。

帕克还将社会秩序进一步分为生态秩序、经济秩序、政治秩序、道德秩序四个方面（Park, R. E. 1952, 157），彼此间有一个层级关系，生态秩序是基础，然后是经济秩序、政治秩序、道德秩序在最上层。仅从生物层面看竞争，竞争是相对不受限制的。但从文化层面看竞争，竞争受到常规、协议、法律的限制。一般来讲，在四种秩序领域中，层次越低的秩序领域，人的自由度越大，即生态秩序上的自由大于经济的，经济的大于政治的，政治的大于道德的。

总之，社会是一个控制性的组织，它的功能就是组织整合、指导构成社会的人。可以说，社会的功能就是限制自由并由此在组织它的部分之间形成更有效的合作（Park, R. E. 1952, 157）。施瓦布把生物社会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差别归纳于以下几点：

1. 人类社会存在复杂的劳动分工和产品、服务的交换体系，这使人

类对地域环境的依赖性减弱,或者说不如动植物对环境的依赖程度。比如,人类可以通过交通和贸易活动从几百公里以外获得资源,这意味着人类可以改变自身与地域环境的关系,而动植物不具此能力。

2. 人类有能力改造环境。在动物界,有些动物也有此能力,如海狸。但相对人类而言,动物的这种能力是极其有限的。麦肯齐明确指出,“作为动物的人类,除具有空间移动能力外,还能改造环境,使之适合于自己的需要。……人类社会能够选择环境,并且还能控制和改变这个生存环境的实际状态”(帕克等,1987,64)。

3. 人类具有语言和文化,这使人类具备远远复杂于动物的组织形式。虽然某些动物,比如蜜蜂,也有自己的组织形式,但它们的组织形式相对人类而言是比较简单的,而且是不可以变化的。

第二节 社区的生态过程

对于古典人类生态学家而言,“空间”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如果说伯吉斯是以“同心圆”分析描述了社区的空间结构,那么,麦肯齐则是以“集中”(Concentration)和“离散”(Dispersion)分析探讨了社区的空间过程。“集中”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人口向某些地区聚集,使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主要表现在向少部分地区的社区运动过程(Mckenzie, R. D. 1967, 50~65);“离散”则是指相反的社区运动过程,即人口向更广大的地区扩散。虽然集中与离散是相反的运动过程,但都是相互联系的、并存的,是人类居住生活发展中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不过在某一时期内,当导致集中的力量强过导致离散的力量时,社区过程就会显示出集中的趋势,否则相反。

一、交通与社区过程

麦肯齐以交通形式为分析工具将美国人居住生活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航运为主要交通形式。在这一阶段,人们主要居住在航道线附近。1850年前90%的美国人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45%的美国人居住在乡村。居住地的形成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而且不同居住地点之间基本上处在分割状态下。

第二个阶段是铁路的出现改变了美国人的居住形式。因为铁路使人们摆脱了航道的限制,人们可以迁移到更为广大的地区居住生活,铁路建设从东部向西部发展,一直达到太平洋海岸,导致了人口向西部的运动。原先荒芜的土地被开垦,新的居住社区得以形成。从1870~1900年,美国新增耕地近5亿亩,这是一个农业机会增长、人口离散的时期。铁路的发展,导致了城市的增长,这一时期的城市增长主要是在那些易于农产品交易的地方。但是,城市不是这一时期社区运动人口离散的主要力量,它不过是农业机会扩展的伴随物;是周边乡村农产品的集散地;是周边乡村的门户(Gateway)。因为铁路并没有改变社区生活的模式。虽然通过铁路,在各个门户性城市间建立起了交通网络,但地区内交通仍以马车为主。铁路虽然消除了不同地区间的分割,通过门户性城市将所有社区带入一个经济整体,但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并未发生本质变化。

第三个阶段是汽车和公路系统的出现对人们的居住生活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它在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周边乡村地区之间建立起了更为密切的联系,使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可以进入更为纵深的地区。曾将城市与周围乡村分开来的界线消失了,一种新的社区形式,即超级社区组织出现了。原来相对分割的村、镇、城市现在成为这个超级社区组织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由不同活动中心组成的复合体,它的发展造成了人口和制度的重新安排,这是一个大都会增长、人口集中的时期。

二、经济活动与社区过程

尽管麦肯齐高度重视交通工具的发明对社区过程的影响,但他最终是把经济活动看作是社区过程(人口空间运动和安排)的决定力量(Mckenzie, R. D. 1967, 51)。在麦肯齐看来,人类的经济活动形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田野工作(Field Work),它的功能是从自然界采取原材料;另一类是集中工作(Center work),它的功能是加工原材料,提供消费和服务。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两类经济活动无论在数量还是在类别上都在增长,但其发展趋势不同。首先,现代交通和沟通技术使集中工作能在更广泛的地域内完成,同时也造成各种经济社会活动和从事这些活动的人的地域性集中;其次,从事田野工作的劳动人口比例相对从事其他经济社会的劳动人口比例不断减少。所以,在美国,尽管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但各地区的增长是不一样的,因为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活动的集中和离散状况不同。